



□宫玉河

作为秦汉古郡县的山东平原县，历史上曾有过两所书院。其中，记录最早的是明代的“闲道书院”，而且由当时山东主管教育的长官——“提学副使”亲自更名。让我们透过史料，揭开这座书院的神秘面纱。

明万历《平原县志·学校志·书院》记载：闲道书院，在东门外里许。先有僧欲建云龙寺。知县郑金改为云龙书院。提学副使邹善改今名，有记。有崇正堂三间，耳房二间，后厅三间，东西号舍共十间，仪门三间，大门三间。万历元年(1573)，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50人，月分三会，给廩饩(膳食补贴)，人思兴起。

既然“有记”，我们不妨通过邹善的《闲道书院记》所披露的信息，进一步了解“闲道书院”：闲道书院的位置在“平原县治东”，与“东门外里许”的表述大体一致。明万历《平原县志·舆地图》标注有“书院”二字，其位置确实在城东，而从仅标注“书院”而非“某某书院”可以看出，当时闲道书院属于全县“独一份”的书院。闲道书院前身，是个名号“云龙寺”的寺庙。“云龙寺”尚未建成就停工，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殊为可惜。恰好，上面提倡建立书院，于是平原知县郑金就召集乡绅名流商议，将云龙寺改为“云龙书院”。后来一位叫邹善的“提学副使”，来平原巡察督学，或是受地方官员所请，或是心有所感，遂将“云龙书院”易名为“闲道书院”并作了一个“记”，这表明“云龙书院”和“闲道书院”具有传承性。

由于寺院建设的延耽、书院更名等一系列变故，史料未能给出明确的建设时间。综合各方信息，可以得出闲道书院这片堂舍的建设时间在明隆庆年间(1567-1572)，才有可能在万历元年(1573)知县王遵义顺利“招生”50人。

对于书院建设、更名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有二：一个是知县郑金，另一个是“提学副使”邹善。

知县郑金，在明万历《平原县志·名宦》记载：“郑金，南皮人，隆庆中，由进士任。端方敏练，宿弊尽革，人不得售其奸。爱民犹子，理邑事如家事。区处合宜，不事阿媚。院司有以厨传不丰为言者，弗介意也。临行，犹愔愔邑事，惟恐一旦废弛而小民失业，穷乡下户。涕泣远送者千余人，迄今民皆思之不置。”可见，郑金为政平原，口碑甚佳。把一个寺庙改建成书院的善举无疑为郑金的功德

锦上添花。

而“提学副使”邹善更是身份不一般。提学副使是提学官的一种，主要职责是监督和管理地方学政事务，包括考选士子应举和选拔生员充贡等，是古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关键人物。

邹善(1521-1600)，明代江西安福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山东提学副使(嘉靖四十三年任，共7年)，广东右布政使、太常寺卿等，万历年间罢官归籍，以讲学为业，著有《诸儒粹语》。邹家系安福名门望族，祖孙五代皆进士。邹善之父邹守益为王阳明嫡传弟子，是江右王学的核心人物。邹家几代都是学者名儒，积极弘扬阳明学派学说，广修书院，兴办讲会。邹善曾跟父亲四方问学，颇有声名，为官期间结识了耿定向、罗汝芳等王门左派学者。在山东为官期间，值隆庆年间，正是阳明心学兴起的时期，他积极在各地创建书院，讲学其中，致力传播王学。

邹善在《闲道书院记》“予为之记曰”后即开宗明义：“昔孟子欲闲先圣之道，而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今之吾道，岂非佛老耶？闲之将如何？欲辟邪以闲，吾到岂惟明道乎？道之不明，虽日倡辟邪之说，终不可得而闲也，何也？道本于心，吾心之体，湛然至静，而足以涵天下之动。凝然至寂，而足以应天下之感。此吾道之全也。”

明万历《平原县志·艺文志》收录的诗文里，有三篇涉及“闲道书院”。三首诗的字里行间，闲道书院既有当年“云龙高栋拱城东，子产当年教化隆”的盛况，也有“月明荒馆草虫闻”的寂寥和荒凉。显然，闲道书院最终被荒弃了。那么，闲道书院到底存续了多少年？我们只能从历史大背景去寻求答案。

明代多次禁革书院。其中，万历年间的这次是张居正搞的。张居正对书院之自由讲学，一贯持反对态度。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以常州知府施观民科敛民财私创书院为由，遂将天下64所书院，概行禁革。

从万历元年“知县王遵义申请选邑生五十人”到万历七年张居正对天下书院的“禁革”，闲道书院统共存在了七年时间。而明万历《平原县志》修书于万历庚寅年，即1590年，距万历七年的1579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

(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德州市政协文史专员)

□卞文志

在中国文化的浩瀚海洋中，有一块小小的墨锭，静静诉说着千年故事，它就是文府墨，徽墨家族中最古老的成员。1978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沉睡千年的墨宝，当时被误认为普通的“黑炭”，却在拼接后发现是采用上等黄山松烟、油烟和漆烟，辅以名贵中药，经过繁复工序炼就的能够“水浸千年不腐”的墨中奇珍。

墨在文房四宝中，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而徽墨则是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据《徽州府志》记载，徽墨始创于唐末，相传一位名叫奚超的易水(今河北)人为躲避战乱，来到了徽州。他发现此地松林茂密，新安江水清澈见底，非常适合制墨，于是便定居下来开始制墨，开创了徽墨的先河。南唐后主李煜获悉奚氏墨的精湛工艺后，视为珍宝。为了表示赏识，他特命其子担任“墨务官”一职，并赐予国姓李，奚氏因此改姓为李。

自此，歙州李墨声名远扬，民间甚至有“黄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歙州也因此成为全国的制墨中心。随后，众多制墨高手如耿氏、张遇、潘谷等相继涌现，徽州墨业迎来第一个繁荣时期。到了宋元时期，墨工们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加入药物成分，从而催生了药墨的诞生。这不仅拓展了墨的使用功能，也促使人们开始收藏墨品，进而推动墨向工艺品领域的转型。

明清时期，徽墨制作迎来了鼎盛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徽墨的产量大幅增加，制墨技艺也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一时期的徽墨，在图案绘制和漆匣装潢方面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到了清代，徽墨制作更是形成四大名家系统，即曹素功、汪节庵、汪近圣和胡开文。其中，汪近圣和胡开文两位大师来自同一故乡——绩溪县，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成功研制出“金不换”的文苑珍品。

这些徽墨佳品中，龙香剂墨、天琛墨、仙桃核墨、紫薇恒星图墨、鱼戏莲墨、西湖十景墨等堪称绝世之作。它们不仅具备“落纸如漆，色泽黑润，经久不褪”的特性，更因“纸笔不胶，香味浓郁，丰肌腻理”而备受赞誉。此外，这一时期的徽墨还根据原料的不同分为松烟、油烟、漆烟和超漆烟等多个品种，其中尤以超漆烟等高级油烟墨最为名贵。这类徽墨散发着紫玉般的光泽，不仅用于书法时色泽黝黑而润，更在绘画时表现出浓而不滞、淡而不灰、层次分明的特点，因而深受书画家的喜爱与推崇。

徽墨的制作过程，堪称是一门精湛而复杂的艺术，从选料到成品，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墨匠倾注大量心血。

先是选料，优质的松烟是制作徽墨的关键，黄山的松树因为生长在海拔较高的地方，树脂含量丰富，燃烧后产生的烟尘细腻，非常适合制墨。接下来是制烟环节，墨匠会将松木切成小块，在特制的窑中缓慢燃烧。这个过程需要精准控制火候，稍有不慎就会影响烟尘的质量，烟尘收集完毕后，还需要经过多次筛选，只有最细腻的部分才能用于制墨。

和墨过程可以说是整个制墨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墨匠会将松烟与胶料按照特定比例混合，然后开始长时间捶打。这个过程通常持续数天甚至数周，一块上等的徽墨至少需要捶打数万次。这个过程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耐心和专注，每一次捶打的力度都要恰到好处，既要让材料充分融合，又不能破坏墨的结构。和墨完成后，墨匠们会将墨料放入模具中压制成型，这个过程也需要技巧，压力要均匀，不能有气泡。

成型后的墨还需要经过雕刻、打磨、装饰等工序，最后才能成为精美的墨锭。整个制墨过程，从开始到结束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艺，造就了徽墨“落纸如漆，千载存真”的特质。描金是制作徽墨的最后一道工序。墨干燥后，匠人们会在这块方寸之地的徽墨上描绘各种款识和纹样，描金后的徽墨，不仅美观，还能起到密封作用。

文府墨是1978年在安徽省黄山市祁门县城区茶科所基地施工时发现的北宋时期的墨锭，是存世最早的徽墨实物，同时也是中国水中出土的墨业实物的首例。文府墨整体呈扁长条状，正面残留有楷书“文”“府”二字，反面残留有楷书“制”字。文府墨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完好无损地来到我们面前，全靠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在千锤万杵之下，徽墨以松烟、桐油烟、动物骨胶和皮胶等为主要原料，配以多种名贵珍稀辅料，在反复捶打、揉搓均匀后，墨条被放入墨盒压制成型。成型后的徽墨不仅工艺精美，还有阵阵墨香。

从小小的文府墨身上，我们看到了古人的智慧和匠心，那些精心选择的原料，那些繁复精妙的工序，无不彰显着古代工匠们对完美的追求。

徽墨融合了书法、绘画、雕刻、装帧等多种艺术形式，被形容为“拈来轻，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徽墨以其卓越品质、精湛雕镂、巧妙装式，赢得了文人墨客的青睐，也赢得了收藏家的珍视。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常用的徽墨有松烟墨和油烟墨两种，松烟墨乌黑质轻，宜书宜画；油烟墨黑亮润泽，为明以后中国画常用。

## 山东『提学副使』亲自更名的平原闲道书院